

20

世纪潮人文化萃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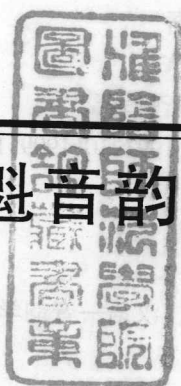
主编 黄赞发 陈梓权

李新魁

音韵学论集

20 SHIJI
CHAOREN
WENHUA
CUIYING

汕頭大學出版社



李新魁音韵学论集

汕头大学出版社



53280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新魁音韵学论集 /李新魁著.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10(1999.11 重印)

(20 世纪潮人文化萃英)

ISBN 7-81036-253-4

I.李… II.李… III.汉语—音韵学—研究—文集

IV.H1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2677 号

汕头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潮阳市新华印刷厂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潮阳市广汕公路古帅路口

1997 年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8

字数:390 千字 印数:1001~2000 册

定价:3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退换

20 世纪潮人文化萃英(丛书)

主 编 黄赞发 陈梓权

副主编 王扬泽 张惠民

20 世纪潮人文化萃英(丛书)

总 序

21 世纪就要来了,站在这世纪之交,前瞻以迎接新的时代,回眸而反思百年风雨。20 世纪的大潮汕,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根本转型的大背景上,随着时代的大潮,挣扎、奋斗、革命、建设,几代潮汕文化人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撞击、交融中进行着自身的辉煌创造,涌现出一批批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享有盛誉的文化巨子。

潮汕地处粤东,苍苍南岭,茫茫南海,天限疆界,既是保护圈,又是封闭线,素有“粤东门户、华南要冲”之称。据考古发现,这一片仁厚的大地,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创造了史前的文明,而潮人文化的真正形成则源自秦始皇之揭岭戍兵,东晋文明的南传,特别是唐代陈元光、韩愈为代表的中原文化的渗

透,一句话,在潮汕本土与中原母体文化的交融中创造了潮人文化的第一次辉煌。宋元以迄明清,古代潮人文化在继续磨合中取得了灿烂的丰收,乃至“海滨邹鲁”、“岭海名都”等盛誉接踵而来。而近代以来以马列思想为主流的西方文化的输入,几代吸吮、咀嚼着儒家理学文化成长的潮汕文化人,尤为难能可贵地取积极回应的态度,主动接收而又不失故步。他们扎根传统,面对世界,潜心学问,深入生活,广收博采,厚积薄发,在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文学及艺术创作,几乎所有传统和现代的学科中都有所建树,出现了杜国庠、饶宗颐、许涤新、秦牧等等这样堪称一流的文化名人。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传统,民族的心理,是一种民族内在韵趣的集中体现。潮人作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20世纪潮汕文化人孜孜以求的耕耘中结出了一个既凝聚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又表现潮汕地方特色的思想文化硕果。《20世纪潮人文化萃英》(丛书)的编辑出版,也就是力图捕捉近百年来几代潮汕文化人在艰辛的文化旅途探索中所迸发出的思想火花,以闪亮

一条新一代潮人乃至中国文化的研究之路。

有关这些潮籍文化巨子思想的文章过去在报刊书籍或已有过展示,但以丛书形式集中地从多角度作大型介绍尚属首次。杜国庠对传统哲学的审视,表现了马列主义者对历史的睿智,许涤新、萧灼基的思考表现了几代中国人对社会主义经济道路的求索,饶宗颐对东方文化底蕴的叩问表现了包融东西的博大与深沉,詹安泰揭示词曲小道所蕴涵的传统的韵致与当代的情怀,还有潘懋元、薛汕、秦牧等等,真知灼见,各具风骚。正是这些能工巧匠同众多的潮人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以中华优秀的理性文化传统为本位,以当代世界的科学文化为前沿,完成文化的交融与创生,体现出广阔的视野和超越的意识,科学的精神和务实的态度,表现出宽广的文化胸怀和价值境界。从而,共同托起了潮人文化的第二次辉煌。

我们来到这样的历史坐标之上,处于世纪之交,传统与未来之间;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百年沧桑与三阳开泰之间;柳暗花明与一马平川之间。在回顾与前瞻的瞬间,我们分明感到任重而道远的深刻内

涵。南海之滨的潮汕,万里波涛对现代人来说,八面来风,正是又一次开放与回应的良机,潮人文化在 21 世纪必将赢得第三次辉煌。

我们编辑这套丛书,旨在为弘扬潮人文化尽心尽力。如果说这批潮籍文化巨子的思想如一颗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那么我们的工作,就是努力把它们串成一条耀眼的珠链,集中显示出 20 世纪潮人文化的精华,以改变人们对潮人文化精细灵巧有加而博大恢宏不足的印象,给世人与历史奉献出一份既属于所有海内外潮人也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品。

黄赞发 陈梓权

1997 年金秋于汕头

李新魁传略

李新魁,字星桥,是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现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音韵学研究会理事、中国民族语言学会理事、广东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广东社科联委员、广州国学研究社社长等职。

1935年10月23日,李新魁先生出生在广东省澄海县的一个书香之家。他从六岁开始在家乡念私塾,学的是《四书》、《五经》,又阅读了家中收藏的大量古书及当时的新式文学书籍,所以自小酷爱文学。十二岁时,他进入正规小学念五年级;1950年毕业后,考入澄海县第一中学。

1955年9月,李先生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入学之初,他也曾幻想当个作家、诗人。然而在一年级学习“现代汉语”时,却对语言学产生了很大兴趣,便转而钻研语言学。最初的契机是对用学到的语言学知识分析自己的家乡话——潮汕方言(粤东潮汕地区的闽方言)感到新奇,于是把原来对文学的热情投入到这方面来了。读二年级时,他写出了《潮州话研究》一书,有一家出版社答应出版,这使他颇感鼓舞(后因客观原因,此书未能出版),从此走上研究语言学的道路。1957年,为配合“推普”工作,与人合作写了《潮州人学习普通话手册》,并发表了好些研究潮州话的论文。

为了学习方言学,李先生自学音韵学,并做了一些研究。

至1957年开始从著名学者方孝岳先生学习语音史,主要兴趣转向音韵学。

方孝岳先生是对李先生的治学道路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方先生于1957年6月间在李先生的一篇习作上批道:“这样的学习基础和钻研精神,又能发现问题,读书得间,在音韵史方面将来必能有所贡献。”在当时,李先生是方先生最为钟爱的学生,方先生的鼓励,以及方先生严谨的治学风范,对李先生后来学术上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李先生毕业离开中大后,仍经常利用星期天到方先生家中向他请教。直至现在,李先生还时时用怀念的口吻谈起他的这位老师。

大学期间,李先生抱着抓紧学习的念头,见缝插针地利用时间。这期间,他养成了博览群书的习惯,把系资料室的图书整架整架地阅读。1959年初,他开始写作《韵镜校证》一书,至1960年基本定稿。

1959年,李先生大学毕业,分配到广东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讲授“现代汉语”。1960年,广东制定四种方言拼音方案,其中潮州话拼音方案由李先生负责起草。差不多同时,他受命参加撰写《广东方言概要》,负责潮汕方言部分,并负责全书的统稿工作(可惜此书后来未能出版)。1962年,调到暨南大学,仍教“现代汉语”。1964年,写《古音概说》初稿。这一

年的9月至次年2月,到天津南开大学从邢公畹先生进修“汉语语音史”。在听课之余,他几乎跑遍京津两地较大的大学和地方图书馆,阅读了大量的音韵学书籍,准备撰写《韵学论著总目提要》(二十年后,与学生合写《韵学古籍述要》时,利用了不少当时收集的资料)。与此同时,他开始在完全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学习和研究西夏文。从大学毕业到1965年这段期间,李先生发表了一些音韵学、方言学和有关民族语言的论文和普及性(包括推普)的文章,其中较为重要的是参加关于《中原音韵》性质的论争的论文。

1965年,李先生下乡参加“四清”。1968年底,李先生和大家一道下“干校”劳动。1970年,暨南大学下马,他被调到华南师范学院,仍在“干校”,至1971年回校参加“教改”。1973年底,调到中山大学,改教“古代汉语”;从1975年开始开设“汉语语音史”课程,并编写了讲义。

“四人帮”被粉碎,学术也得到了解放。1979年以后,李先生著述甚丰,至目前为止,已出版著作24种,发表论文约80篇,知识性文章约200篇,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的瞩目。1979年,中国民族语言学会成立,李先生当选为理事(连任三届至今)。1980年,中国音韵学研究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副会长(连任两届后,研究会决定取消副会长一职,他继续任理事

至今)。1981年,全国高校文字改革学会成立,他当选为理事。1984年,当选为中国语言学会理事;1992年,当选为常务理事至今。1986年,广东中国语言学会成立,他当选为副会长(连任两届至今)。1988年,李先生有鉴于传统“小学”需要多学科交叉、联系、综合起来研究才能有新的突破,发起成立广州国学研究社(任社长),以期联合文字、音韵、训诂三方面的研究力量,对古汉语作形、音、义的综合研究。

李先生于1979年升为讲师,1981年升为副教授,1985年升为教授。他曾多次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1983)、日本大东文化大学(1990)、台湾中山大学等(1992)讲学。

李先生在语言学上的研究领域比较广、包括音韵学、方言学、文学学、古代汉语语法和词汇、少数民族语言和古文字等。

音韵学是李先生研究的主项。在等韵学方面,他对“等”的起源提出了独特的看法,针对向来的“等”专为韵母分类而设的观点,认为它最初是对声类的分类,后来才扩展为对整个音节的分类,中古韵图对等的划分仍是声韵并重(《汉语等韵学》,专著出版时间参看本文附录,以下凡括注年份者为论文);深入地阐释了历来认为难解的等韵门法(《等韵门法研究》1980);对一些重要的韵图作了较详细的研究(《〈韵镜〉研究》1981、《〈起数诀〉研究》1984等);对众说纷纭的“内外转”问

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论内外转》(1986));他的《韵镜校证》、《汉语等韵学》以其资料丰富为人所称道,尤其是后者介绍了许多未为学界熟悉的韵图,填补了一个重要的空白。在近代音研究方面,他反对《中原音韵》表现元代大都音、入声已消失的观点,认为此书表现的是元代汉语共同语的代表——以洛阳音为主体的河南音,并认为当时中原之音仍存在入声(《〈中原音韵〉的性质及其代表的音系》1962、《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和“入派三声”的性质》1963等);主张其时的知、照组声母读为舌尖后音,且能与[i]相拼(《论近代汉语照系声母的音值》1979);对前人论述较少的近代汉语语音的发展作了较全面的梳理,并提出了好些重要观点(《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1980、《宋代汉语韵母系统研究》1988、《近代汉语全浊音声母的演变》1991等);他的《〈中原音韵〉音系研究》是《中原音韵》研究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在上古音方面,他进一步论证了晓、匣母的上古来源(《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1963);为上古声母拟订硬音、软音、圆唇化和卷舌化等几套音,而认为上古韵部为36个,主张一部中可以包含2至3个略有不同的主要元音;分上古声调为甲(相当于中古阴、阳声韵的平声和入声韵的入声)、乙(阴声韵上声)、丙(次入韵的入声,即后代的去声)三类(《古音概说》、《汉语音韵学》)。在中

古音方面,认为《广韵》包含古音和方音成分,所以主张以《广韵》为主要资料、参照宋代其他语料来拟订中古音(《中古音》);对中古音研究中最为繁难的“重组”问题作了多角度的探讨,提出重组两类和普通三等韵在较早期可配为一个个“大韵”,以及重组 B 类为声母带圆唇化的观点(《重组研究》1984);论证《切韵》中床、禅两母并无对立(《论〈切韵〉系统中床禅的分合》1979);对《广韵》音系作出了不同于前人的拟构,突出的特点是重视圆唇元音的作用,如以元音圆唇与否区分“真假合口”,即开合分韵如“寒一桓”中的合口韵主要元音为圆唇,从而否定了真假两类合口介音之说;认为轻唇化的条件之一是真合口,即主要元音为圆唇(《汉语音韵学》等)。此外,他还写了一些谈音韵学应用的文章(《论古代文化研究中运用音韵手段的若干原则》1989 等)。李先生音韵学研究的一大特点是:在各个分支学科中都花了不少气力,并且获得相当成果,而收相辅相成之效,更能从总体把握语音发展的规律。

方言学是李先生语言学研究的最初立足点,他后来也一直坚持这方面的研究。其研究的重点是潮汕方言,编有几种有关的工具书,发表了不少论文(《潮州话的几种特殊句式》1958 等);他也研究粤方言,写了一些论文(《广州话语音的内部差异》1991 等),并于 1987—1988 年间主持了《广州方言志》

的编撰工作。他特别重视对方言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作研究(《论广州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1983、《广东闽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1987、《吴语的形成和发展》1987等);在潮汕话本字考释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潮州方言词考源》1964、《潮汕方言词考释》等);继五、六十年代的推普,到七、八十年代又做了大量的工作(《广州人学普通话》等)。

李先生在古代汉语语法方面有不少新颖独到的见解,如词类活用问题(《古汉语词类活用中的诸种述宾关系》1979)。他的《汉语文言语法》是对古代汉语语法描述较为详尽的著作。在古汉语词汇方面,他专门研究了“类别词”,作了全面的搜集和分析(《类别词汇释》)。文字方面,他分析了“互体字”(《互体字简论》1981),对“转注”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也考释了一些单字。他编过一些古汉语教材,其中《古代汉语自学读本》既不乏新见,又能照顾读者的水平,是同类教材中较受欢迎的。

在少数民族语言方面,李先生研究潮州畬话(《潮州“畬话”概述》1963,合作)和古代党项族的语言——西夏语(《论西夏文的形体结构和造字方式》1978、《西夏语的辅音系统研究》1980)。

李先生做学问注意三条原则:

第一,精专和广博相结合,认为既要立足于专门的研究,又要有较广的知识面,后者为前者服务。李先生的主要研究学科是音韵学,但他对语言学的其他领域也非常重视。例如他认为搞音韵的人也应搞方言,这会对音韵学的研究有极大裨益,这一点他除自己身体力行外,还常嘱咐他的学生分一些精力研究方言。他的视野还越出语言学之外,对文学、历史、经学等各方面的材料都加以留意。他平时喜欢浏览各种图书,从中摄取有用的知识。例如他提出宋元时代的共同语音是以当时的中原之音为标准音的观点,其中许多有力的证据就是在通读《词话丛编》时发现的。音韵学内部也有分支,李先生研究的重点是等韵学和近代音,而对中古音和上古音也着力不少。他认为若把自己局限于一点,研究就很难深入。

第二,对材料的分析和理论上的探讨相结合。学者们做学问,各有不同的风格,有的人倾向于重视材料的收集和排比,有的人更强调理论对研究工作的指导作用。李先生主张先广泛搜集材料,特别是要善于发现新材料,就材料本身加以分析,而不为成说所拘;如果材料与流行的理论冲突,就决不让材料迁就理论。如他写《汉语等韵学》之初,对一般所说“等”的概念并未产生怀疑,后来发现许多材料与这种说法不相吻合,经反复思考,便提出自己的新见解。他还常对学生

说,对那些跟自己的观点、理论有齟齬的材料,不要讳言(他诙谐地称为“反贪污”),而应正视。这不但体现了他磊落的学风,也可见他对材料的重视。他又认为,材料若不最终统以理论,就不免流于细碎、烦琐,底层研究的价值就得不到提升。对音韵学的研究,他特别强调要有“史”的眼光,在作断代的、局部的研究时,要总想着汉语史是一个连续的整体,这样才能把自己的研究提高到能够把握语音发展大势的高度。他常说,他的老师方孝岳先生最讲究“大势”;把握了大势,才不会被材料所淹没。新的见解往往一方面建立在新的材料的基础上,另一方面建立在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两者不能偏废。他常告诫学生,不要写那种只会堆砌材料,而提不出自己看法的文章,更不要写那种只拿到一点材料就迫不及待地用一些理论来大加发挥的文章。

第三,细水长流的积累和集中的专题研究相结合。有一些研究专题往往需要在一段较短的时间里集中力量攻关,但有的专题就非要有较长期的积累不可。常有这种情况:零星的材料经过日积月累,到一定时候就变得很可观,形成一个基础,再在这个基础上集中时间和精力,有目的地找材料、作研究,就能出成果。李先生为写《汉语等韵学》,利用各种机会,把国内重要的图书馆几乎都跑遍了,一点一点地收集资料;